



一个家庭，二位老人，然后有三个孩子。

人生正如一出戏

~ 四十年的岁月 ~

叶昆灿

现在回想起来，年青时的那段读书学习的时光是愉快、温馨，令人回想的。但是毕业后，在社会上工作，竞争、奋斗、颠沛、曲折崎岖的道路，那种有上坡下坡，曲折不平，峰回路转，有酸、有甜、有苦处、也有欢乐、有缺漏、有满足。这个阶段会使人觉得更充实、更实在，会有更多，更有意思的回味。

我们是南大的第一届毕业生。第一届毕业生要面对许多新的、未可知的问题，正像第一届学生在学校建筑未完整的那样，校园内的草未长好，电灯的发电不够，水供也



到现在已有四位孙子。

经常出现问题，但是，我们要面对，我们要适应，现在，一个未知数摆在毕业生面前，社会怎样接待这批毕业生呢？

有人很快就找到一份好的，理想的工作，有人找了很久，还是不容易觅到一份工作，有人再去读书……。真是五味杂陈，五彩缤纷。

面对各种各样的面试形势，面对了各种各样的工作问题：我们要请的是对社会有贡献的；我们是纯女校，学生都大了，不敢请年青的男教师；我们要的是能教高中毕业班，可你们都没有经验。……有的要先试教3个月，有的是领高中毕业的薪水，有的是领临时薪水……。

这大概是我们毕业时的一般境况。

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中正中学执教，接到功课表是高三历史6班12节，高二历史2班4节，高二华文2班14节，合共30节。那时是高中最后一届，高二要考高三的功课，也就是说既要教书，又要复习，而且用来赶教，又希望能

考好成绩。下午还要赶到教育学院受训。时间是很紧的，而且，说实在，不论是高三，高二的华文、历史，都是新的功课，都要找资料，做笔记，更好的说法是现买现卖，还要应付学院的功课作业，及看教学，查作业等。

这工作是既紧张又刺激，而且是周而复始的，每日都是一个样，于是久了也开始麻木了。

第2年，教高一，也是第一届的大学先修班第一年，虽然，报考是第2年，但是一切都是新的，课程是新的，制度也是新的。

1966年，学校突然要我担任教务主任一职，这又是一个新的行业，新的工作，新的挑战。教导主任好像是做了3年。因为68年担任高一的功课，鉴于有始有终，免得高一升高二的学生让别的老师接任不能适应，因此虽然辞了行政工作，但是有关教学工作，还是要向旧的学生负责的，于是坚持教完应负的课程。在69年底离开了中正中学。

70年我转到教会学校——公教中学。这是我的第2份工作。

当时鉴于在中正担任行政工作产生的一些问题，于是在公教的第一件事是向校方表明不担任行政工作，以便只从事教学工作，图个不用承担责任，不受闲气。

但是，这种生活好像也只有2、3年的时光，72年又受委为教务工作，74年竟然接任了校长一职，一直到83年离职。

有人说在社会上许多时候都靠机遇，也有人说，在社

会上工作，不能太聪明，不能太计较，我想这些在读书的时候是不管用的，也没有人会相信的。但是，在工作场合中，有时也不无道理，不管怎样，运程也是一时的，许多时候也靠拼搏。

大概是我在教书后的2、3年里，有一年假期，突然要我学习安排功课表。这是一项相当大的工程，1、2个人操作，有相当的困难，最好是人要多一点，多1、2双眼睛去共同盯住，瞄准每个格子内的科目、教师等，因为工作一整天，尤其是到了夜晚，更重要的是快收尾，结束的时候，错误是最可能发生，也最会发生的，而且一错了，正所谓：一步之错，满盘皆错，牵一发动全身，错不得的。

也不知在那种情况下，我竟被叫、被邀请去排功课表。1、2年下来，也有了多少的经验。到了自己当家的时候，要来排功课表，要掌握时，也就比较有把握了。

也许是少年气盛，血气方刚，有许多用不完的精力，也许是一开始就要承担那么多的压力，同时也没有家庭的负累，于是在62年，在又是老师，又是同事的吴以湘先生引进，带入了“中教”。从此就与这个会，跟除了教学之外的教育工作又加深了关系。在中教会，除第一年担任文书之外，以后在章程修改后就出任秘书长及最后那1、2年任副会长，而且是长达20多年。

六、七十年代是一个波动的年代，许多教师在工作上，在申请教职，在延长教学，在肯定职位时，在薪金问题上，教师会都要起一些“催促”、“督促”的作用。此外，就是在教师的福利工作上，在教学上，在出版上，我

们都根据章程，“讲究教育”，“推动教育”等工作，同时，对于出版事业，也是很着重重视的。

那时，在中学教书的，南大毕业生似乎占了很大的比重，因此在教师会暨职工会内，南大生就自然而然占有了相当的数量，因此，我们认为有必要让几个重要职位予非南大者，这样工作才会顺利，也比较有代表性。如果全部占有，那也不难做到，可是，那就太没意思了。

在63-66年间，我也曾出任教总的总务一职，也做了一些事情。记得当时是推介华校的优点，号召家长送子女进母语学校，以及一些福利工作等。

这一次的工作，得了一次很好的教训。当时，有人来跟我说：你是正总务，就管跟政府有关的工作，其它的工作都由我来做好了。原来，他看中的是购买东西的工作，政府部门他当然没有兴趣。

再次的选票，我虽然得了很多，竟然压过了主席，选举结果做了一个普通理事。

这两年，我也普普通通过去，拖完了这一届。

这是一种社会工作，也是一种社会现象。

这段时间，我也担任了南大毕业生协会的副会长，秘书等职务，也曾任过篮球总会整10年的理事。

最为难得的是，我代表了南大毕业同学会的两名校友代表之一，担任过执行理事及理事会理事，大约是在66-78年这段期间。

在这个会议的组成人员中，有许多是社会侨领，各界领袖，大家都是一时俊彦，都是一方霸主，都是负担了好

多自己的工作，事业，可是遇上了会议，或者有者担任的是要长时间关心学校行政工作，决定性工作者，但他们却无补偿地工作，而且还要费心、费神，还要出力、出钱，这种精神真是难得。而且他们都是义务的，他们既不是南大生，也不是南大培育、教育出来的。

我因此感悟到，社会的工作是需要社会各阶层来关注的，而且如果能得到越多关心越好。

我也因此感悟到做社会工作必须是胸怀宽广的，胸襟要宽大的，一个人再能干，还是一个人。

这也是我在担任新加坡文艺协会工作过程的观点，而且工作时间越长，这种心态就逐渐扩大。

流行在社会上不是有这么一句话：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吗？

南大的开办，正是许多社会关心教育人士的关怀下，不论是上流社会或下层阶级，都争相响应。我们这些毕业生都沾有了这份恩惠，都感受到这种恩泽，因此，在社会需要的时候，在自己能力所及的情况下，都愿意竭尽能力的。

70年代的新加坡，许多学校还保留了自己的特有的传统，坚持自己的原则，比如有的学校的校长一定是自己的族人，自己的同乡，自己的会馆；一些教会学校，有的也一定要自己的教徒莫属。

当时，我是以一个非教徒出任行政工作，实在是一个异数。做为非教徒，我反而在应该进行宗教仪式等方面给予更大、更宽广的支持。

学校是标榜双语教育的，当然，在9大特选中是要更好的贯彻双语教育。

我当时的责任是：维持良好的声誉与成绩表现，争取更多更好更优越的成绩，在竞争的行列中维持良好的竞争能力。

我们做的是教学工作，我们要教好别人的孩子，让他成材、成人，有好的成绩、品德的表现。对于自己的子女，我们也尽力提供，营造一个环境，让他们能尽力表现，所幸3个子女，都在90年代初期，先后在美国取得硕士学位文凭，也很庆幸的是3人都回到新加坡来，在新加坡工作，伴随我们两老。

南大第一届同学，到现在除了少数几位以外，大多数都是60开外了，都已告老退休了。

做为一个老人，有人主张还应该有些固定的工作来做会比较合适，因为维持一定的压力，一定的工作范围，对于生理心理都有经常的压力操作，这对于脑力，脑神经会有一些的作用。因此，到目前为止，我还是维持着一些所谓不务正业的社会活动工作，尤其对于自己一路来兴趣的文艺工作，还是花大量的时间、精神、去推动，去工作，而且乐此不疲。

除了在新加坡的时间之外，3、2个月，也要收拾包裹到国外去视察，管理一点业务。

从毕业算起到现在，应该是40年了。这40年，我们走过了人生必须经过的道路，不管路是怎样的，我们都已走了。

有人说：“人生正如一出戏。”但是，究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，抑或是我方唱罢你登场。那都是一场唱不完，永无休止了结的戏。

回顾40年的路，我们留下了很多，虽然很多是微不足道的，但是做为一个人的人生历程，那多少有值得回味无穷的地方，最少在个人自己。

路并不到此为止，我们还要再走，再走。

可以预计及肯定的是：未来的路，会比较少甚至不太可能再有波折的。

我们正在渡此晚年！

31.5.99